

书评



学术建制与理论拓展：评刘涛《视觉修辞学》

汤 黎

书名：视觉修辞学

作者：刘涛

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1 年

ISBN: 9787301320648

DOI: 10.13760/b.cnki.sam.202202020

自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视觉文化转向起，随着新兴媒介的不断增殖，超文本和网络话语等新文本形态在社会语境中呈爆发之态。丹尼尔·贝尔指出，在后现代的语境中，视觉观念占统治地位；在一个大众的社会里，图像不可避免地成为美学的统率力量。（1992，p. 351）在高度视觉化的文化语境下，图像成为文化生产、传播和接受活动的重要场域，视觉因素则成其创造、表征和传递意义的重要手段。在当下“时空凝缩”和“景观社会”之修辞语境中，各种纷繁复杂的文本需要有与之相对应的修辞理论体系；由此，视觉修辞学这一跨学科理论话语的发展显得尤为迫切。视觉文化的发展促使了修辞学知识体系的内涵重构，从线性认知逻辑的语言修辞范式转型为动态和多维的复合型修辞范式。视觉修辞探寻视觉符号如何形成于思维，分析图像如何在消费文化的语境中被生产、运用和阐释。跨学科的视觉修辞学是理解和分析当下语境中种种社会文化现象并解读其交互主体性融会的有效策略。然而，从目前学界的研究状况来看，囿于视觉文化的复杂性和传统修辞理论在当下语境下阐释有效性减弱等因素，视觉修辞的学术建制还未能形成完善的体系。

在此种背景下，刘涛所著《视觉修辞学》一书的出版具有突破性的意义。

一、基于传统修辞学之上的视觉修辞学理论构建

本书开篇即指出，视觉修辞学是以视觉文本为修辞对象的修辞学知识体系（刘涛，2021，p. 1）。视觉修辞学发端于20世纪60年代，在修辞学领域的“图像转向”语境中逐渐壮大，并于21世纪初出现了成为一门显学的趋势。若要对从零散到日益体系化的视觉修辞研究在历时和共时层面进行爬梳，首先需要从理论问题、修辞议题和学术机构三个方面来对视觉修辞进行学术溯源。本书从对新修辞学的出现、视觉传播的兴起、学术团体的认可这三个标志性学术事件的追溯开始，梳理了视觉修辞学术脉络上的各重要节点，阐释了视觉修辞意义机制之两大主要路径：视觉修辞的符号学解释路径和修辞学解释路径。基于对视觉修辞之学术谱系的考察，本书的开创性意义得以展现：力图改变视觉修辞学目前理论单薄的状况，在梳理和拓展视觉修辞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之上科学和系统地完善视觉修辞学的理论体系，并结合中国的学术传统、思想体系和社会现实对西方的视觉修辞研究进行本土化改进，由此使其真正在学科建制的意义上成为一门学科甚至是显学。

视觉在对世界进行感官认知、建构和协调意义、人类共存和交流等方面都起到了关键作用（Aczel, 2016, p. 69）。米切尔指出，文化的历史部分地是图像符号和语言符号争夺主导话语权的延展式争斗的历史（1986, p. 43）。“学界对视觉研究持续上升的兴趣表明了这样一个文化现实：图像业已成为20世纪信息传播的主导途径；此种情况可能甚至会持续到21世纪。”（Heller, 1996）在视觉修辞研究中，文字和图像、语言文本和视觉文本、印刷文化和视觉文化等新旧研究范式的研究侧重对象是互相渗透、互文对话的关系，既互相重叠又相互矛盾。

修辞学具有持续对话性，修辞传统在理解我们周遭的符号影响如何能够在人类不可逃脱的语境中激励人类行为方面是极为有效的资源。在后现代语境中，将所有话语视为劝服手段的修辞学重获生机；语言研究从语法向修辞转向也使得修辞学的重要性重新凸显。视觉修辞学的发端、发展同广义修辞学的蓬勃发展具有密切关系，这种新修辞学认为修辞是认知性的。在这样的理解范式中，“视觉实践及其象征行动被赋予了一种全新的内涵和意义”（刘涛，2021，p. 363）。飞速发展的技术使物质条件和社会条件持续多样化，此种变化激发了新修辞学的蓬勃发展；修辞学的多样性也在此语境中得到了充

分体现。复杂的物质条件和社会条件需要视觉修辞学不断从各种学科中汲取养分，保持其对实践阐释的有效性。

罗兰·巴尔特有关视觉修辞的观点可谓为视觉修辞学的出现起到了先锋性的作用。他聚焦于不可见的劝服形式，这可以在他关于“刺点”和“展面”的观点中得到体现。“刺点”如同伤痕，带有隐喻式的、扩展的力量；而照片中呈现的“它曾是”的时间就如“刺点”，是具有文化意义的伤痕（巴特，2003，p. 149）。“展面”与“刺点”之间是幽灵式的互文和对立关系：“刺点”的增补寄生于“展面”的空间之中（Derrida，2001，p. 42）。照片犹如缝合了“展面”与“刺点”、生与死、在场与缺场、自我与他者等二元对立。他的理论对视觉修辞学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推进作用。在《影像的修辞》（*Rhetoric of the Image*）一文中，巴特把视觉修辞学定义为“意识形态的符号层面”。他指出，视觉文本的展示、安排和感知这三者融合而形成一个劝服性的隐含意义（2012，p. 94）。由此，语言/符号的话语可用来定义以视觉修辞为主导的符号文本之固有意识形态体系。《视觉修辞学》的理论构建之语义分析起点正是从“刺点”开始，从其符号结构与构成逻辑切入。

个体或社会以交流为目的来生产视觉符号，而视觉修辞关注其符号再生产的交流过程（Foss，2004，p. 303）。基于视觉的话语比基于语言的话语更能激发受众的感知经验，因而对个体经验、主体直觉具有更多的关注。修辞学和符号学都关注视觉空间中符号的生产、传播和阐释。视觉修辞学强调，符号在其内涵和外延上都存在亟待被激活的潜在意图，为受众提供了替代性和多样化的视角。视觉修辞强调文本的偶然性；修辞文本的生产、接受和阐释同文本的生产时间、地点和生产方式等密切相关。视觉修辞学在理论上和实践上从图像、修辞等学科的知识型构、学科传统汲取养料，又脱离不了对文本语境的实践性考量。

Charles A. Hill 和 Marguerite Helmers 在《定义视觉修辞学》（*Defining Visual Rhetorics*）一书中指出，研究视觉修辞学的学者涉及“通过非书面媒介来阐释图像”（Hill & Helmers，2004，p. 18），并将视觉修辞学定义为“观看和阐释的框架性分析”（p. 65）；然而此定义忽视了视觉修辞学在文本生产层面的作用。视觉的人为制造是技术的物质产物，其生产、再生产、流通、消费等，都在个体和集体行为中得到体现（Hope，2006，p. 4）。在此复杂的意义制造过程中，视觉图像在修辞层面的审视，以及修辞、劝服和认同的聚合体，都融入视觉修辞体系中。《视觉修辞学》对于视觉修辞的研究，关注的则是视觉修辞的生产、传播、接受这一系列的动态链条。

本书首先聚焦于视觉修辞研究的学术范式,不仅回应了“修辞范式”这一修辞学命题,还对视觉修辞学的认识论和问题域进行挖掘,探寻了视觉修辞学范式的本质属性。视觉修辞理论体系中的修辞范式及其内涵作为对修辞机制的回应,其意义原理在语图关系、释义规则、隐喻/转喻这三个维度得以展现,体现视觉修辞运用的意义机制及其深层修辞结构。语图关系指视觉文本的语图结构及其互文机制,这是视觉修辞学研究的核心问题;通过对文化语境、情景语境、互文语境这三种语境形态及其互文关系的分析,可以探寻图像意义生成的底层释义系统。

在意义生产上,语言和视觉互相缠绕,可经由修辞来审视社会文化和政治体制。本书探讨了文字和图像的多媒介文本的形式意义结构,指出对视觉修辞学的认知机制可从视觉意象和视觉图式这两大理论命题来展开论述。“象”在中外文论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本书通过对原型意象、认知意象、符码意象这三种基本视觉意象形态及其修辞内涵的分析,论述了文化意象的生成原理、加工机制等,将西方文论的图像传统和修辞传统同中国文论诸领域的传统进行有机结合。此外,本书通过对认知心理学和认知语言学视域的考察,探寻这两者之间的关联。本书以具体的视觉化的文本形态为修辞对象,聚焦于视觉修辞学的方法论体系,考察如何对视觉文本进行策略性的使用以及如何对视觉话语进行策略性的建构,由此对视觉文本的修辞语言、活动与规律进行学理意义上的研究;从分析方法和批评方式这两大命题来探讨视觉修辞学的议题、话语、实践,并在理论构建的基础上以本土化的案例分析进行阐释;从视觉话语和文化观念两个维度,探寻视觉修辞学的批评范式和实践路径。

视觉修辞学的学术建制的一大障碍是其跨学科性。跨学科性与结构主义范式的学科疆界相悖,因而视觉修辞学不可能再以整体性、连贯性和宏大范式来展开学术建制,而是要通过视觉再现和阐释的多学科途径,进行开放、持续的学科建制。《视觉修辞学》对于视觉修辞学的建制思路正是基于此。概言之,本书从知识社会学理论视角出发,注重对观念史研究范式和路径的探索,在对图像学和修辞学进知识考古式学术史梳理的基础上,通过理论梳理、建构和实践,试图更好地把握时代的话语观念,增强其阐释有效性。

二、视觉修辞学中的权力话语与视觉修辞模型的构建

从个体和社会的层面而言,视觉修辞新形态在生产、传播和劝服等过程

中与受众和技术的关系密切相连。后现代理论认为人的主体性是去中心化、分散的。新技术让当下的交流越来越依赖于视觉再现的模式，无处不在的视觉图像渗透到各种形式的公众和个体话语中。麦克卢汉和昆廷·菲奥里指出，在电子信息时代，媒介由社会中相互依存的信息以及个体生活的方方面面重塑（McLuhan & Fiore, 1967, p. 8）。此种变化让我们对各种观念、行为和机制进行重审和重估。自 20 世纪晚期起，媒介形态就综合了听觉和视觉修辞。视觉修辞的发展促进了在图像维度上多元主体之间的积极对话。换言之，图像转向为各主体提供了一个协商性的参与空间，此空间成为各权力话语展开意义争夺的场域。基于皮尔斯修辞学路径，修辞实践呈现公共性、对话性与社群性等特征（赵星植，2018，p. 166）。视觉修辞学对视觉文化语境中权力关系和身份认同、主导意识形态，对特定事件和时期的叙述和审视，对形象、凝视机制、身份或欲望的主体性审视，对公众记忆、集体身份认同和文化认同的构建等，都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视觉修辞学通过分析多样化的视觉修辞来探寻其背后的权力话语，从而将公众的演说可视化，并由此探寻大众对社会文化的视角和观点。视觉修辞在修辞－阐释的处置上具有社会建构主义的倾向，以把文本置于技术再现和劝说、控制、压制、意识形态的具象化等为特征，由此揭示文本中有潜力形塑受众的感受、思维和行为的符号或策略。

在当代文化的视觉转向这一语境中，各种复杂的社会文化权力互相制约。在视觉文化时代，视觉再现的生产和分配虽然受主导意识形态的影响，但技术的普及让公众在其中有了更大的参与度。视觉修辞的“交易式经验”（transactional experience）往往处于特定的社会条件下，其劝服机制背后是深层的权力运作机制。在此种研究范式中，社会话语和个体话语之间的权力运作形成主导且被主导、互文而又冲突的张力。个体的知识话语型构同公共话语建构的知识逻辑之间的相符性和相斥性并存，社会语境中体现不同话语观念的各种争议性话题便是其表现。本书在概念生产、释义结构、跨域映射、符号意象、框架再造这几个修辞原理的基础上，沿着话语内涵、话语情景、话语再现、话语框架这几个层面展开，从“意指概念”（ideograph）、“语境”（context）、“隐喻”（metaphor）、“意象”（image）、“接合”（articulation）这五个相互关联的修辞问题切入，开创性地提出了具有视觉话语建构意义的修辞批评模型——CIMIA 模型。

在该书理论实践部分的个案研究中，以公共议题建构与传播实践中的图像事件为代表的事件文本占据了重要位置。皮尔斯认为，符号意义的生产是一种动态的互动协商行为（赵星植，2018，p. 166）。在同一文化共同体中，

基于集体文化记忆和身份认同感等因素,个体对符号意义的传播与交流有着本质性特征。当符号学分析扩展为与文化批评相关的广义分析时,传统修辞学中“图像反映现实”往往就转变为了“图像应该反映现实”。相较于宏大修辞叙事而言,此种转变注重个体对图像的回应,强调修辞伦理。本书作者指出,图像政治是再造“现实”的视觉逻辑。“当前,公共议题的建构以及社会争议的形成,越来越多地诉诸图像化的方式和经验,也越来越多地依赖视觉符号的劝服实践”(刘涛,2021,p.381)。

视觉文化时代的图像在公共舆论动员和公共议题构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个体政治话语和社会政治话语交汇的场所。为提高视觉修辞批评在新语境下的话语实践的有效性,该书建立了可供借鉴的视觉修辞批评模型。在新社会运动中,图像事件的重要性日益彰显。该书作者聚焦于修辞语言、修辞表征、修辞话语、修辞情景和修辞文化这几方面问题,从图像事件的视觉形式、符号内涵、话语原理、生态系统、文化模式这几个维度,从视觉文本语言和视觉话语实践这两个层面,建构了图像事件的修辞批评模型。如前一部分所述,本书强调了“刺点”这一概念在视觉修辞中的重要意义,在视觉景观中分析其扩张性、不稳定性、破坏性,“从而在符号聚合实践的意义上搭建了一个公共话语形成的互文语境”(刘涛,2021,p.417)。

三、基于劝服机制探讨修辞“五艺”在视觉修辞学中的拓展

虽然目前学界对视觉修辞学的定义未达成一致,甚至在某些层面还存在相悖之处,但这些定义都强调视觉文本的修辞特征以及视觉修辞的劝服功能。传统修辞学以传统的文本形态为研究对象,其劝服机制通过对语言符号的策略性使用来实现。在视觉文化时代,随着文本形态的变化,传统视觉修辞学的劝服机制已经丧失了对新文本形态生产和传播的阐释有效性。新媒体技术的发展让文本的传播途径大大改变;在修辞实践中,劝服位于核心位置。劝服的有效性表明了吸引注意力、影响思维、唤醒情感、改变态度、提高行动效率、变换立场等交流能力。与此同时,在修辞劝服的背后有着非抽象的、感知交流的存在,此种存在中视觉是知识、经验和表达的来源(Aczel,2016,p.70)。视觉修辞学可视为“通过劝服来挑战未来和激发变化的话语”(刘涛,2021,p.76)。视觉修辞学的劝服机制则通过研究图像及图文之间的相互作用来实现。图像中的劝服资源,即图像结构、视觉证据、视觉比喻等,在视觉修辞学的实践中得到了充分运用。作为视觉修辞实践在劝服视域最核

心的问题，视觉劝服直接决定了图像符号在传播实践中的功能和意义（p. 347）。由此，通过开展批判性的视觉修辞批评，可以探寻劝服性话语在图像维度上的编码方式以及象征权力的图像化生产机制。如要更有效地发挥视觉修辞学的实践作用，最关键的命题是发挥和利用视觉修辞的劝服功能，实现图像维度上的权力或利益目的（p. 348）。《视觉修辞学》立足当下的修辞情景和传播实践，发掘了传统“修辞五艺”的协同机制和对话结构，并对视觉话语和图像事件进行具体的个案研究，使其在理论创新和本土实践上都焕发生机。

该书作者认为，修辞“五艺”这一传统修辞学的重要思想遗产仍然是视觉修辞学的重要理论资源，对当下的视觉文化现象分析仍然有实践意义。如何从传统理论中发掘资源，让其重新焕发生机，使其适应新的传播环境？该书通过对传统修辞“五艺”之内涵进行借鉴、反思与拓展，为视觉修辞学研究做出了标志性的贡献。作者以《人民日报》发布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H5作品《复兴大道70号》为案例，对“修辞五艺”即修辞发明、修辞谋篇、修辞文体、修辞记忆、修辞发表这五个话语视角进行适应新语境的实践更新。《复兴大道70号》选取了重大事件的焦点时刻为叙事对象，在修辞发明层面具有很大的研究意义。该作品采用了时间叙事作为修辞谋篇的主要逻辑，注重个体体验和宏观叙事的有机结合，将对市井画面的呈现融进了国家层面的历史叙述中。由此，该作品在修辞美学上既大气磅礴，又不失细微刻画，呈现了修辞文体的丰富性。在对该作品在修辞记忆维度的分析上，作者创新地重新审视了视觉修辞体系中的修辞记忆这一重要问题。文本生产者及接受者的记忆问题与修辞效果息息相关，能否对记忆问题进行有效的挖掘和分析体现了修辞的劝服技巧高明与否。《复兴大道70号》有别于传统的视觉文本，所采取的H5技术运用数字媒介与受众进行互动，通过增强参与感来增强了文本接受者的记忆，而受众记忆的增强也加深了该作品在宏大维度的媒介记忆与社会记忆。正如作者所言，“修辞者往往扮演着记忆代理者的角色，即通过文本生产来影响并调适一个时代的记忆方式”（刘涛，2021，p. 359）。在修辞发表的创新层面，《复兴大道70号》呈现了渠道融合与跨媒介叙事融合的格局。

从以上的个案分析可见，作者对传统“修辞五艺”在新的理论背景和社会语境下的重审与拓展，不仅在理论构建上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在实践层面上也具有相当的有效性。通过挖掘“修辞五艺”在视觉传播语境下的新特征和新内涵，该书作者构建了由修辞发明、修辞叙事、修辞美学、修辞效果、

修辞传播这五个维度构成的视觉修辞批评框架。在此框架中,话语建构、文本结构、形式语言、符号功能、传播策略这五个修辞批评内含的主要问题与上述五个维度一一对应,指向一个完整的修辞过程。

结 语

当下社会语境中,随着修辞再现的多样化,修辞批评不再以传统的文字文本为主要研究对象。它超越了意图论和工具论的阈限,深入扩展到社会文化实践、个体和集体无意识、认同体系和本体论系统层面。在日常生活世界的意义实践中,视觉修辞学从其宽广的社会视野来探索视觉秩序和修辞秩序的社会学和政治的经验性承诺。正如作者在后记中指出,视觉修辞研究应在理论和思辨层面之上注重其在当下社会语境中的实践。视觉修辞学的发展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视觉符号的话语实践和把握视觉话语生成的修辞原理,有助于图像成为一个建构性的、协商性的、争议性的意义场域。该书建立了视觉修辞学的学科合法性和实践有效性,探寻人类在视觉修辞意义上的生存方式,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该书作者怀揣系统性建构视觉修辞研究理论体系的学术使命感,为解读视觉文化时代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提供了革新性的知识话语和实践路径,为视觉修辞学的学科建制历程书写了不可或缺的篇章。

引用文献:

- 巴特,罗兰(2003). 明室:摄影纵横谈(赵克非,译). 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
- 巴特,罗兰(2012). 影像的修辞(邵一平,肖熹,译). 电影艺术, 2, 94-101.
- 贝尔,丹尼尔(1992). 资本主义文化矛盾(赵一凡,等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 刘涛(2021). 视觉修辞学.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 赵星植(2018). 探究与修辞:论皮尔斯符号学中的修辞问题. 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 1, 166-172.
- Aczell, P. (2016). Rediscovering the Visual in Rhetorical Tradition: Persuasion as Visionary in Suasory Discourse. In Andras Benedek & Agnes Veszelszki (Eds.), *In the Beginning was the Image: The Omnipresence of Pictures: Time, Truth, Tradition*, 69-85. Peter Lang GmbH: Internationaler Verlag Der W.
- Derrida, J. (Ed.) (2001). *The Work of Mourning* (Pascale-Anne Brault & Michael Naas, Trans.).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Foss, S. K. (2004). Framing the Study of Visual Rhetoric: Toward a Transformation of Rhetorical Theory. In Charles A. Hill & Marguerite Helmers (Eds.). *Defining Visual Rhetorics*, 303 – 304. New Jersey: Lawrence Erlbaum.
- Heller, S (1996). *Visual Images Replace Text as Focal Point for Many Scholars*. The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
- Hill, C. A. & Helmer, M. (Eds.) (2004). *Defining Visual Rhetorics*. New Jersey: Lawrence Erlbaum.
- Hope, D. S. (2006). *Visual Communication: Perception, Rhetoric, and Technology*. Cresskill, NJ: Hampton Press.
- Mitchell, W. J. T. (1986). *Iconology: Image, Text, Ideolog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McLuhan, M. & Fiore, Q. (1967). *The Medium is the Massage*. New York: Random.

作者简介:

汤黎, 四川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 主要研究方向为西方文论、英美文学。

Author:

Tang Li, professor of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Cultures, Sichuan University. Her research fields include Western literary theories, and English and American literature.

Email: tony111226@163.com